

中國近代史

遼寧大學

1960年8月

第一章 第一次鸦片战争和中国人民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斗争的开始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夕的世界和中国

一 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社会概况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仍然是封建社会。土地绝大部分被皇帝、满洲贵族、汉族官僚地主所占有。农民没有和很少有土地，即是占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也因地主之兼并土地，在不断分化破产中。占田之情况，是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占田的地主，并不耕田，而依土地剥削压榨农民劳动；不占田的农民，却要依靠耕田过活。农民不得不从地主手中租种土地来过活，但地主确从农民手中夺去百分之五十，甚至达到百分之七十、八十的粮食收入作为地租。清政府又摊派到农民身上大量的赋税。商人、高利贷者又乘农民之危，苛贷粮款、渔肉于农民。三位一体剥削下的农民，依靠土地劳动收入，势难维生，遂不得不乞助家庭副业收入辅助生活。于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就牢固的结合在一起了。每个家庭“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产品”^①。农村即成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小天地。当时中国的经济结构，主要是这种经济细胞而组成的。在这种经济单位中，占有土地不同，生产地位不同，财富分配也不同。官僚地主集团，依靠土地剥削农民，集中了大量的财富，赖以过着奢靡极欲的生活。农民虽终岁劳动，然被层层剥削结果，再加水旱灾害的威逼，反到经常难得温饱。自然经济是中国封建专制的基础，农民贫困落后的根源，阶级关系紧张的主要依据。

除了自然经济外，商品经济也有所发展，并推动了租赋货币化。清政府征收赋税，以银为正赋：地主收租，也普遍的征收货币。租赋的货币化，又活跃了商品经济。在江南，沿海地区，纺织、冶铁、煮盐、制糖、烧瓷、造纸等手工业中，已有高度的分工，多种工序。生产中出现了作坊主，包买商；也出现了大量“计工受值”的手工业工人。手工业产品，也有广泛的销路和市场，有的具有行銷全国性质，有的甚至行銷到国外。如江南之布匹、瓷器就是这样。这种手工业的生产形式，是“手工业带有原始资本主义形式的小商品生产，与大机器工业之间的中间环节”^②。“较多的劳动者，在同时同地同一资本的命令下，生产同种商品，在历史上在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出发点”^③。在农业上虽然“资本主义渗入农业特别迟慢”，^④但是农产品之商品化，还是有着明显的迹象。棉麻桑、蚕的生产量增加了；烟草、甘蔗、水果园的经营也有所增加。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农产品之商品化的发展，促使商业和城市的兴盛。苏州、杭州、南京、广州、佛山等，都是工商业繁盛的城市。这些城市不仅集散着国内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594页

②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五三年版，343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384页

④同②133页

城乡交流的商品，而且还集聚着往来南洋一带的商人，集散着中国、南洋交流的商品。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城市的兴盛，出现了包买商，转运货物的商人，手工业作坊主；也出现了计工受值的手工业工人，城市贫民等，这个市民阶层的出现，不仅使地主农民的阶级关系复杂化起来，而且使反封建的斗争上，也必然由于市民阶层的加入斗争而复杂起来。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出现，都是瓦解和动摇封建制度的因素。所以毛主席说：“中国社会内部之商品经济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影响，中国也将缓缓的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①

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有所发展，和自然经济比起来，毕竟还是微弱的，这样就不足以根本动摇和瓦解封建经济基础。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微弱的原因大致有下列几方面：第一，封建地主阶级依据地主土地所有制残酷的剥削农民，是阻碍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主要原因。土地被地主占有，农民用高价租种地主土地，终年劳动所得，大部分收入被地主，清政府所窃夺去了，所余尚不足以维生。遂使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牢固的结合起来，互相辅助，缺一则难以维持生活之路。因而就不能使生产力提高，使生产技术改进，手工业生产规模扩大；是以手工业绝大部分处于家庭手工业阶段、难以向手工工场阶段发展。同时也使农产品不可能更多的作为商品投入市场，使农产品商品化受到了限制。第二，清政府之“重农抑商”政策，对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起了窒息作用。第三，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商业都有封建成分，也都束缚了手工业、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不少商人是封建地主，在商业中所获得的利润，投资到土地上，而不扩大商业；手工业之行会，限制雇用工人数量，限制技术自由传播，阻碍手工业规模迅速的扩展。总之，封建主义束缚了限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维护了封建经济。但是“经济的发展，总是无情的，无例外的打通自己的道路”②。

清统治阶级被兼并土地，横征暴敛，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引起了各族各层人民的反抗斗争。1809年，江西有胡秉辉领导的起义；1813年，河南、北京有李文成、林清领导的起义；1817年，广东梅县发生起义；1820年，新疆发生了回族人民起义；1831年，湖南发生了瑶族人民起义；1832年，广西发生了天地会起义……这只不过举出几次大规模起义之例而已，小规模起义是此伏彼起，连年不断。这些起义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起义的成员不少是手工业工人、学徒、船夫、水手，纤夫。这样斗争就显得复杂化了。这些冲击封建统治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阶级矛盾并未曾丝毫缓和，相反更加尖锐起来，并酝酿着新的更大规模的起义斗争。

建筑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封建专制制度，随着起义浪潮的冲击，更加反动和腐朽了。清政府的组织机构，虽有汉族官员参加统治、但实权却在满洲贵族手中、而最高的统治者，又是满洲皇帝。在这种绝对专制统治下的政治，是阿谀逢迎充满官场，贪污纳贿之风到处流行。清统治者，奉行民族压迫政策，因而不但各族人民反清压迫，就是满汉地主间，也存在着深刻矛盾。清政府虽有八旗，绿营兵马八十万；分驻四方，外貌巍峨，声势尚壮；但武备松弛、纪律败坏，实际上已经经不起更大规模的起义浪潮的冲击，也不能作有效的抵抗外国侵略的工具了。

在文化上，清统治者一面提倡封建文化，麻痹知识分子，一面实行高压政策、压制反清思想发展。提倡程朱理学、八股科举；用前者维持封建道德秩序，通过后者消磨知识分子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596页

②恩格斯：反杜林论，189页

精力，从而笼络知识分子为清廷服务。同时又推行清初文字狱政策，抑制反清思想发展。但反清思想仍然通过各种形式出现，清初部分知识分子，拒绝为清廷服务。置身汉学之中从事事音韵、训诂、辨伪、校勘、辑佚等考据工作，具有反清政治意义。但到乾加学派出现时，尽管汉学学术研究有成绩，但脱离现实，知古不知今，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已失去清初汉学的战斗光輝，所以清廷也提倡汉学，阻碍文化进步，阻碍反清思想发展。但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市民阶层的兴起，使汉学又产生了其反对派，即经今文学。本来经今、古文学之争，始于汉代，几经斗争，时融时分，斗争也时起时落，沿續到清朝中叶，随着社会变化，经今、古文之争又被提到日程上来。经今文学反对汉学的逐字逐句之繁琐考据，主张“微言大意”，“经世至用”。嘉庆年间，庄存与著春秋正辞，不言训诂，发挥了何休之公羊解诂的微言大意精神，其甥刘逢祿和宋翔凤二人附之，史称常州学派，是为近代经今文学之始。道光统治初期，经今文学代表人物为龚自珍。龚自珍（1792—1841）浙江仁和人，又名定盦。出生地主家庭，作过小吏，作小吏时失意。本人幼年受过著名汉学家陶冶，青年时又接受了刘逢祿之影响，遂成今文学大师。他鉴于封建社会之黑暗和危机，在其著述中加以无情的揭露和讽刺。他指出“京师其尤甚者”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不可以支日月，暇間年岁？①他警告统治阶级说：“贫相轧、富相耀、贫者阽、富者安、贫者倾、富者壅。……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間，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癘、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②。他劝告统治阶级说：“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議无不靡”③“若不急思所以救之，恐异日之破坏条例，将有甚焉者矣”④，“与其贻来者以勃改革，孰若自改革！”⑤他建议统治阶级用宗法的家族关系“授田”，反对限田遏欲。他对现实社会黑暗的揭露，改革建议，都反映了现实的矛盾。他的改良主义倾向，对后来改良主义思想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龚自珍其人，也即成为改良主义前驱者了。

从战前之社会概述中，可以看出：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坦已出現资本主义萌芽；封建统治虽然日益反动和专制，但却日益腐朽；思想文化方面虽程朱理学占重要地位，但却出现了改良主义主张；各族人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矛盾未曾缓和，更大规模的起义正在酝酿中。凡此种种情况，表明中国社会面临着巨变的前夜。但是，中国社会尚未发生巨变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即侵入中国了。

二 鸦片战争前夕的世界概况

中国发展到封建社会末期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发展到资本主义較高的阶段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英国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先后发生美、法资产阶级革命，并开始掌握了政权。资产阶级当政，给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闊的道路。十八世纪后半期，首先在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随后又逐渐的推广到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中去。于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都有长足的进展，其中英国尤为突出。英国的煤产量，1795年时，为1000万吨，1836年时，增加到3000万吨。铁产量，1800年时，为193000吨；1840年时增加到140万吨。

①定盦文集：西域置行省議

②③同上平均篇

④同①乙丙著議第七

⑤同②

紡織工业发展的更快，在十九世紀中叶时，紡織厂的动力，全部采用蒸气动力了。用棉量，由十八世紀七十年代的年用500万磅，增加到1840年年用量的25800万磅。所以英國被稱為“世界工厂”。法國煤产量，在1825年时为20万吨；1840年时增加到350万吨。鐵产量在1830年时为18万吨，1840年时增加到35万吨。輕工业1840年的产量，为1815年三倍。不过法國当时，小农业仍占重要地位。美國在工业发展上，虽然落后英法，但是新式資本主义工业已經建立起来。其他資本主义国家工业，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这些資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是靠对内剥削工人剩余劳动，对外残酷的掠夺殖民地來实现的。工业是发展起来了，社会矛盾也跟着发展和尖銳了。英國工业发展突出，資本主义矛盾发展也特別尖銳。首先在英國出現了經濟危机。馬克思指出其周期性說：“1825年危机……1830年市場过充，大危机……1938年營业不振，危机……1837年大蕭条”。随着經濟危机，阶级斗争也尖銳起来。英國在1832年发生了工人暴动，列寧称为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形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840年，工人又发生了暴动，政府出动了军队镇压。其他資本主义国家，也受到經濟危机影响，不过不象英國那样突出罢了。資本主义国家，为了緩和危机和矛盾，即加强了对外掠夺。其中掠夺最积极的也是英國。1817到1824年間，征服了許多印度的封建王邦；1824年，征服了馬來半島之新加坡，并进入緬甸；1838年威胁伊朗；1839年发动侵略阿富汗之战争；同年又威胁中國。法國等資本主义国也家向扩张势力。所以列寧說：“資本主义如果不經常的扩大其統治范围，如果不把新的国家殖民地化，并把非資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經濟漩渦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①。資本主义国家向外侵略和掠夺、正是其社会矛盾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在資本主义瘋狂掠夺和扩张下，亞非地区的国家，落后于西方国家，成为西方扩张和掠夺的对象。鴉片战争前夕，非洲的地区，大部分被英、法、荷、葡、等資本主义所侵占。鴉片战争前夕，印度已淪为英國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已被荷兰控制之下。美英荷等势力，也侵入了日本，不过尚未把日本变成殖民地的地步。緬甸已被侵入，英國势力；朝鮮、越南也面临着資本主义威胁。中國当时还保持着大帝国之姿态，資本主义业图侵略中國还是有所顧慮的。但是中國人口众多，經濟落后，又成为資本主义侵略者所垂涎的侵略对象。英國資本主义力量发展突出，要求侵入中國之欲望也迫切，这样必然在以后的侵略活动中，居主凶地位。法、美侵略欲望虽不减于英國，但国力較弱，尚无单独侵略中國能力，必然使他們在侵略中國活动上，居于帮凶地位。他們之間有矛盾，但为了共同对付中國，而取得了利益均沾的共同諒解。

三 中外关系，“閉关政策”

战前中國和外国之交往上有三种关系，首先即是中国和朝鮮、越南、琉球、緬甸等国之关系，即所謂宗藩关系。具体的来往是这样：中國在其国王繼位时候，加以冊封售印；受封的国家，在一定的年限到北京称臣納貢一趟。納貢时将土产珍品送来；然后清朝皇帝再加倍偿還金珠綢緞等。納貢时期有时成了定期的貨物交換关系。中國为宗主国，負有保护和帮助御侮之責任，但实际上对保护下的被保护国之政治、軍事、經濟独立毫不干涉。宗主、藩属关系只不过空名罢了，它和殖民地，保护国的关系根本不同。

其次中國和俄国的关系，平等的，封建性质的貿易关系。自从1689年8月，中俄簽訂尼

^①列寧：俄國資本主义发展。

布楚條約以後，划清了兩國國界，解決了兩國糾紛。1693年又簽訂了北京商約，允許俄商每三年來北京貿易一次，居留八十天。1727年又訂恰克圖條約，以恰克圖為貿易地點，北京通商活動停止，兩國商人集中在此進行貿易。當時俄國尚無侵略中國之意和計劃；“俄國的商業與英國商業相反，俄國的商業並不會使亞洲生產的基礎發生變動”^①，對中國影響也不大。中俄兩國在鴉片戰爭前，百五十年相安無事。

第三、中國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海盜、商人的關係。西方海盜商人之接觸中國，可追溯到十六世紀。自从地理大發現以後，葡萄牙商人即向東方發展。當時正是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一接觸中國，即以海盜姿態出現的。1517年，葡有八艘武裝商船進入廣東屯門港，進入港即鳴槍放炮，時人第一個印象就是：“大炮迅烈，震駭邁近”。1557年又以詭詐手段，霸占了澳門。繼葡人之後，其它各國陸續來到中國。西班牙商船在1575年，首次來到中國。它同時要占據東南亞一帶，逐中國華僑，屠殺中國華僑。1603年，在菲律賓一次即殺華僑25000人之多！荷蘭商船在1601年，首次來到中國。之後，即欲侵佔台灣後來和澎湖，被民族英雄鄭成功所逐。英國商船在1637年首次和中國接觸，進入省河，三次攻擊沿岸，燒毀了虎門炮台。法國商船第一次來到中國是1698年，到中海面，即窺探廣州形勢。美國商船在1874年，也來到廣州。這些武裝商船，來到中國後，鳴槍放炮，沿海掠搶，有時尚拐騙人口。這種海盜行為，人人憤恨，對西方武裝商人，咸以洋鬼子之號以稱之，以示對之憤恨。這種海盜行徑，冒險行為直至十七、八世紀之後，才側重海上貿易。

十六、七世紀時，西方和中國之海上貿易中，英國尚无关輕重的，但是到十八世紀時，英國在東方的商業活動才有所發展。特別是英國控制印度後，並用政治、軍事力量保護東印度公司進行貿易；並給予東印度公司訓練軍隊，設立法庭，製造硬幣等特權；於是英國對中國之貿易額增加了，其增加情況如下：

年 代	各國入口總值（海關兩）	英國入口值	百分比
1765—1769年	1,774,815兩	1,192,619兩	67.2%
1800—1804年	8,727,364兩	7,715,556兩	88.4%
1830—1833年	9,192,618兩	7,335,023兩	79.8%

年 代	各國從中國出口值（海關兩）	英國運出值	
1765—1769年	4,177,909兩	2,190,915兩	52.9%
1800—1804年	10,397,797兩	7,556,473兩	72.7%
1830—1833年	13,443,641兩	9,950,286兩	74%

可見，英國對華之貿易額，不管是出口值或者入口值，都占絕對優勢。英國向中國進口的商品有從西方運來的呢絨，棉織品，玻璃、鐘表；有從南洋運來的棉花、香料、檀香等土產。英國進口之“奇技淫巧”之物的東西，銷售量不大，而向英國進口之茶、絲、大黃等，年年增加，這可從下表得到切實的證明。

年 代	英國向中國進口總值	英國從中國出口總值（單位每年平均海關兩）
1765—1769年	1,192,915兩	2,190,619兩
1780—1784年	1,301,931兩	2,083,346兩
1800—1804年	7,715,556兩	7,556,473兩

^①馬恩論中國：2頁

1820—1824年	6,525,201两	9,816,066两
1830—1833年	7,335,023两	9,950,286两

英國進出口之貿易額，既是入超，就不得不向中國輸入白銀；在1708—1712年之入中國貨物價，只值5000余磅，現銀達50000磅；1758—1762年之入口貿易價58000余磅，現銀仍5000余。據統計，從1729—1730年二年中進口白銀，約百萬兩到四百萬兩。所以清政府官員常賈上奏折中指出，英夷“所載貨物無几，大半均屬番銀”①。

英國和中國貿易，之所以往往入超，正是中國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市場狹小的反映。馬克思確切的指出：“前資本主義各國生產方式的內部堅固性和結構，對於商業之分解作用，是一種障礙，英國之對印度、中國通商上，得到了切實的證明”②。

英國對於自然經濟的抗拒作用不了解，認為是清政府之“閉關政策”限制結果。其實“閉關政策”，不獨清政府採用，所有的封建制度都採用的一種保護封建統治的政策。因為英國攻擊中國，所以即加以“閉關政策”之名。借以攻擊中國。清政府採用的“閉關政策”，也不是始終和英國貿易，而是在清初即開始了。清初時，明遺族、民族英雄鄭成功據台抗清，清政府即下令禁止片板下海，是為海禁之始。鄭成功后代抗清失敗後、康熙一度解禁，並開始四口貿易，但主要交貿地點還在澳門。西方海盜的亂跑、亂竄沿海，清政府有所顧忌，遂閉三口，獨留廣州。是為海禁之再起。1758年以後，只有廣州交易，外商成聚於此，互相紛紛滋擾，清政府即不能不加以限制，於是英國對這種限制稱為閉關政策。

清政府所以採取一些限制，即：所謂“閉關政策”，是自然經濟基礎的反映。清朝向例是提倡重農抑商的，對外商業關係也不被重視，即所謂“天朝物產丰盈，原不借外夷之物以通有無”。清政府為了維護這種封建剝削制度，生怕“內憂外患”串連起來，破壞了封建統治秩序，所以馬克思指出說：“毫無疑議十七世紀末葉，在對華貿易上彼此競爭的歐洲各國的紛紛傾軋，曾給滿洲人排外政策以一種有力的幫助。但是更主要的，乃是這個新王朝的疑惧，它恐怕外國人會支持大部分中國人在被韃子征服後大約最初半世紀所存在的那種不滿情緒。由於這些考慮，有時除了經由一個距離北京次產茶區極為遙遠的城市——廣州之外，外國人被禁止了與中國人發生任何往來，外國人之商業活動也被限定與行商交往，政府特許這些行商專門從事對外貿易，借以避免其餘的人與任何可增的異域人發生任何聯繫”③。“清政府為防止中外發生聯繫，採取一些限制措施。

首先，令外商之商業活動，咸與公行商人交往。公行在廣州共有十三家，故又稱十三洋行。他們承銷外國商品，代購原料；公行商人互相約定商品價格，個人不許單獨漲落定價，十三洋行共同的壟斷了對外之貿易。同時他們還代清政府征收關稅，並辦理一切外商之公私事宜。公行即是商業機構，又是外交機構。所以外商與之交往時手續即多些。船鈔、規銀、行用條目冗雜些。其次，清政府對外人在中国之活動，也有些限制，據李侍堯之防夷五事規定中有：外商不許在廣州過冬；行商對外商管束檢查；不借外商資本；不給外商服役，不給傳遞書信；派兵船在停泊商船處稽查。加慶時期，又增加外國兵船不准入內港；外商不准久駐澳門。道光時期又增加外商不許私運武器；禁止外商雇用買辦；禁止坐轎；禁止番婦入城；不許擅自出入商館等條文。第三，商品之出口也有些限制。糧食，五金；軍火武器，書籍等

① 文獻叢編，十七輯：8頁

② 資本論：第三卷412頁

③ 馬恩論中國，28—29頁

禁止出口。絲之出口量也有一定數量。綜上所述，即所謂閉關政策的內容。這些內容大多是維持封建統治，堅持主權要求的措施規定，但其中也有些規定不完全恰當，有些條文規定在一定程度上，是限制了商業活動。

封建“閉關政策”的實行，限制了商業的發展，阻礙了經濟交流，對於經濟發展，起了阻抑作用。阻礙了資本主義文化和技術的輸入，使中國固步自封在封建文化圈子之中，阻抑了文化科學之發展。封建閉關政策維護了封建制度，維護了封建統治，但却阻礙了經濟文化的发展，因此它是反動的政策。但是西方商人來到中國，往往武裝騷擾；而在正當的貿易上，也具有傾銷商品、掠奪原料擴大市場之侵略性質；儘管清政府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實行閉關政策主要出發點也不在此；但在客觀上對海盜行為，對具有侵略性質的貿易也起了一定的自衛作用。

封建閉關政策既然對資本主義國家之商業活動，經濟掠奪欲望有阻抑作用，於是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便把中國所遇到的所有不滿，都發泄到“閉關政策”上來。他們認為“閉關政策”阻礙了市場擴大，阻礙了其工業品之傾銷，以至不得不付出大量白銀來購中國茶絲，影響了資本積累，影響了追求利潤的目的。所以英國千方百計的想打開中國市場，想要清政府放棄閉關政策。

英國資產階級為了達到其侵略欲望；採用軍事的外交的交涉手段，威脅清政府放棄“閉關政策”。

英國打開中國“閉關政策”的企圖，可上溯到清政府閉三关口之時期去。閉三海口之二年後，英國即派遣洪任輝與中國交涉，希望開放其他港口，被清拒絕。1787年又派加茨喀特來華交涉，但中途死去，而未得結果。1793年，英派馬甘尼來華，以慶祝乾隆六十壽辰為名，要求開口岸，割一島；無理要求被婉言拒絕。1816年派阿美士德來華，重提馬甘尼要求，加慶未允其要求。東印度公司專利權在1832年取消後，要打開中國市場欲望更加迫切了，英國派律勞卑來華，和兩廣總督盧坤交涉，仍無結果。1836年，義律來華交涉，一直到戰爭爆發，其無理要求一直被清廷拒絕。與外交交涉同時，又用軍事手段威脅。1775年即有多艘武裝商船在浙江沿海示威。1816年時，隨阿士美德來的武裝商船即炮擊廣州，要挾實現其要議求。1833年時，東印度艦改司令胡夏米（密合士利），一面在中國沿海刺探情報，一面建議英國採取炮艦政策來爭取簽訂條約。1834年律勞卑也曾令炮擊廣州要挾盧坤，但事未有結果，律勞卑退到澳州憂慮死去。1836年，馬侖又帶兵船在廣州示威。

在上述之外交交涉活動和軍事威脅活動沒有達到打開中國市場要求的時候；鴉片貿易，却是日益增加其貿易量，於是英國即準備經營鴉片，用鴉片來打開中國市場了。同時還伺機準備挑撥威脅。

第二节 严励的禁烟运动

一、鴉片走私的猖獗

鴉片原產印度、阿拉伯等地。在七、八世紀時，天方（阿拉伯當時名）商人帶入中國，名為阿芙蓉，合浦融等，作藥用，或賞其花，並無人吸食。十七、八世紀時荷蘭商人將鴉片及南洋吸食之法，一起輸入中國，於是鴉片成為嗜好品進入中國了，並有了鴉片、阿朧之，

名。鴉片輸入增多，吸食者增多，被英國商人發現。正置英國和中國貿易中一直出現逆差之時，既不能不付白銀，又不能用工業品打開中國市場，過去的外交交涉，武力挑撥打開市場之目的都未成功，新的機會尚未找到。於是英國資產階級商人集團、政府官員，即全力經營鴉片，企圖用來打開中國市場。

英國看到鴉片能大量運往中國，而在一七五七年時占領鴉片產地孟加拉地方，並在一七七三年確定了鴉片貿易政策。當時印度政府的英國總督宣稱“鴉片不是生活必須品，而是有害的奢侈品，除僅有的對外貿易目的外，它是不被容許的，明智的政府應該嚴格限制鴉片的國內消耗”^①！應該指出，所謂對外貿易，主要是對華貿易。英國在印度的總督，明知鴉片是毒品，而限制國內消耗，但確積極鼓勵向中國銷售，充分的顯示了英國資產階級損人利己的本質！奇怪的是英國政府，竟偽裝文明風度聲稱鴉片貿易與帝國政府无关，甚至無恥的簽訂虛偽的禁止鴉片貿易條約！這種騙人之假面具不能不加以揭露。英國政府在1773年給予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之鴉片專賣權。1780年時，“英國東印度公司實行了它的壟斷權，把這種貿易全部握在它的手里”^②。1797年“東印度公司又取得了製造鴉片的特權。”^③之後，即全力經營鴉片貿易了。英國政府在印度“以印度政府的資格，又強迫孟加拉省種植鴉片……它強迫一部分印度農民種植鴉片，用墊款的辦法引誘另一部分農民也去種植，用嚴格壟斷的辦法操縱這種毒藥的大規模製造，派遣大批的官方偵探來監視以下全部過程：種植鴉片，把它交到指定地點，熬制得使其適合中國吸食者的口味，裝入特別便於走私的箱中，最後運往加爾各答，由政府標價拍賣，把它從國家官吏手中移交投機商人，然後轉入走私商人手中運入中國”^④。可見英國政府對鴉片的生產過程，是全部參加並加以干預的，只不過未有由政府出面，直接運到中國而已。英國所以宣稱鴉片貿易與其政府无关，不過是在各國人民面前，正義輿論面前掩蓋其丑惡罪行而已。後來，具有半官方性質的東印度公司也表面上不參與鴉片運輸和贖賣，甚致在1816年後，還規定公司船隻不准裝運鴉片來華。其實這也不過是一種騙人的伎倆而已。誰都知道來往中國的船隻，是被東印度公司控制的，只有東印度公司發給它執照，才能往來運輸。但在執照中，却有一項條文規定“除運輸東印度公司自己生產的鴉片外，不得運輸任何鴉片”。這樣既或東印度公司不出面，東印度公司之鴉片，也會被其控制下的船隻不斷的運到中國來。1834年，東印度公司之專賣權被取消了，它由商務機構改組成純粹的行政機構，對華貿易是私人企業來執行任務了。於是在自由的對華貿易下，不但東印度公司之鴉片商，繼續向中國贖運鴉片，而且還吸引了更多英國商人，投入販運鴉片的行列。這樣運入中國的鴉片就與日俱增了。

鴉片是毒物，在中國例屬違禁品的，英國既不能公開合法的販運，即通過走私來進行鴉片貿易。首先，在廣東海面囤積大量鴉片準備運入中國，侵華的英人賓漢曾供出走私情形他說：“金昌門……在這裡停留各種大小不同的船隻，有些是臺灣船所載的主要貨物是鴉片，這些船隻多少年來都沒有移動……自早至晚，走私的船隻，從這些船隻上運走鴉片……這些走私船，往來如織，不勝繁忙。……走到鴉片船上，到處可以看到一個活潑的，發財的，買賣的

①馬恩論中國28—29頁

②馬士：中華帝國國際關係史1卷198頁

③三所集刊：第一集117頁

④馬恩論中國87頁

气象。在甲板上一边堆着巴特那和貝拿勒斯鴉片，另一边又堆着摩拉瓦鴉片。^①其次，在中国内地制造一个鴉片走私网，清政府湖广道監御史奏折中曾指出走私网情况：“該夷（指英人）敢于附近虎門之大魚山洋面，另設夷船囤积和烟土，称为鴉片臺。并有夷目兵船名曰护貨，同泊一处，为之捍卫。……勾通士混以开设錢店为名，其实暗中包售烟土，呼为大窑口。……奸商到店与夷人議价立券，以凭到臺交貨，謂之寫書。……則有包攬走漏之船名曰快蟹，船之大可容数百石帆張三桅，两旁尽設鐵網，以御砲火，左右快槳、凡五六十，来往如飞，呼为種翼。……巡丁呼之，則抗不泊岸，追之則去无及，竟敢施放枪砲，勢同对敌，瞬息脫逃，关吏无如之何，俱干重咎匿不报官，是以白昼公行，肆无忌憚。……查关津口岸，皆有巡船所在如織，不难搜捕，无如各巡船通同作弊，按股分職……其由大窑口，分銷內地，則有奸民串同各衙头役，开设私局，是为小窑口，散布各城乡市鎮。^②”鴉片通过这个走私网，渊源进入中国，清政府的禁烟令均于失败。

清政府关于鴉片的輸入，不只一次的下令禁絕：自1729年到1820年之90余年中，所謂禁烟第一个时期中，曾經九次下令禁止私运，販卖，吸食；但是鴉片輸入量由二百箱增加到五千箱^③。自1821年到1834年，所謂禁烟第二个时期中，也曾九次下令禁止私运、种植，吸食；但是鴉片輸入量由年入五千箱增加到三万箱^④！百余年之中下禁令将尽廿次，而鴉片之輸入量却愈禁愈多，除了英国积极走私破坏中国法令外，也和清政府之政治黑暗有关系。陝西巡撫富呢揚阿在奏折中曾正确的道及这一点：“鴉片之禁已非一日，其风不熄而愈熾者，非立法不严，实稽察之不力。……是与販者确有来踪、不难稽查，而开館者咸在通商大邑，更不能掩人耳目，如果各省大吏督率認真查緝，何至不可遏絕？^⑤”地方当局所以稽查不力，是接受了鴉片販子之賄賂和收买。鴉片販子和清朝官員互相勾結“議定規銀每箱若干，这些規銀系与总督銜以及水路文武官員。惟关口所得最多，此項銀兩皆予备存在英國或他國鴉片船上，以便分派。……然亦有將鴉片准折，每次自一箱以至一百五十箱为止。^⑥”于是广东水师巡船“每月受規銀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⑦。鴉片入境后，奸民和衙門头役勾結互相为奸，鴉片在內地即盛行了。所以禁令之破坏，正是“侵蝕天朝官僚政治的肺腑，的破坏宗法制度的屏障的賄賂行为，和一箱箱鴉片一起停泊在黃浦的英國臺船上偷偷的运进了中国”^⑧的結果。

鴉片大量走私到中国，英国政府和商人都获得了巨大的血腥的利益。首先使鴉片集团获得了高额利潤：东印度公司經營鴉片，获利情况以1813年为例：公班士每箱成本費237卢比，它的拍卖价格，包括印度政府鴉片稅在内，每箱2,428卢比，拍卖价超过成本九倍，而东印度公司得其中三分之二。鴉片販子轉运鴉片，販卖中获利情况以1817年为例：公班士之印度卖价为每箱1,785卢比，在中国之售价为2,618卢比，二者差額約有四百元之多，除少數运费外，余为利潤。其次，英国工商业集团，在鴉片貿易中，也获得了利益；曼彻斯特利

①宾汉：英軍在华作战論記，叢刊五8—9頁

②馮贊勸諭陳夷人帶鴉片煙入口租幣請飭查嚴禁折，叢刊一，166頁

③參看馬士：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第一卷，198—200頁

④同上參看201—208頁

⑤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以下称始末，卷三、十頁

⑥澳門新聞紙：叢刊二，427—428頁

⑦姚薇元：鴉片戰爭史實考13頁

⑧馬恩論中國：84頁

商人曾供出說“……自印度向中國撥款，並且轉運印度的出产作为印度侵入我們對印輸出的媒介”①。其意即言：我們向印度出卖之工业品，只有鴉片集團將印度鴉片販出賺了錢，印度才能購買商品。可見工商业集團和鴉片集團，存在着血肉般的联系，鴉片集團获利，它也分潤。第三，英國政府和印度政府也获得了巨大利益；英國鴉片集團以鴉片易中國之絲茶。特別是茶運入英國後，英國茶稅收入大量增加，“由1793年60萬磅，增加到1833年的330萬磅，成為英國政府主要財源之一”②。印度政府30%收鴉片稅，也成為政府之重要收入項目，1829年鴉片稅收入“超過100萬磅，約占全年總收入的十分之一”。③可見鴉片走私，使英國政府，商人都獲得了巨大的血腥的利潤，這就是英國資產階級和其政府，熱中于鴉片走私的原因所在，也是不肯放棄這個不道德的鴉片貿易的根源。英國鴉片販子，成為販毒的罪魁。

美國進行鴉片走私的伎倆，也不亞於英國。十九世紀初兩廣總督上奏折中曾說：“獨美利堅國內少國王鉛束，竟系船主自带鴉片來粵”④。美國走私鴉片、不能從印度販運，不得不從土耳其，波斯地方又購買鴉片，繞半個地球的路程，來把毒品運到中國海面。然後“除几句好話，一筆賄賂外”；還用特制的一種武裝走私船，在美國國旗的掩護下，抗拒巡船檢查，進行武裝走私。美國走私數量增加，以致引起英國鴉片販子的恐惧，他們向倫敦政府說：“若不加以制止，將嚴重的損害英國的貿易。”⑤所以美人丹涅特得意地承認：“在鴉片貿易的這方面，美商人所得的將遠較任何其他國家的商人为多⑥！”美國販運鴉片數量仅次于英國，成為販毒之主要幫凶。

二、鴉片流毒中國各，階層之反映

鴉片隨着英美之武裝和賄賂下走私，清政府官員納賄放私入口下，源源進入中國。輸入量歷年增加情況如下⑦：

年 度	年度平均箱數
1795—1799	4,124
1800—1804	3,562
1805—1809	4,281
1810—1814	4,713
1815—1819	4,420
1820—1824	7,889
1825—1829	12,576
1830—1834	20,331
1835—1838	35,445

其流毒地區，廣到“小窓口，散布各城鄉市鎮，指不勝屈，所在皆有”⑧的程度。流行之

①英國蘭皮書：曼切斯特商人致巴麥尊子爵呈文：叢刊二，634頁

②③第一次鴉片戰爭——外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开端，三新集刊一集117，119頁

④清代外交史料，叢刊一，137頁

⑤美國侵華史：6頁

⑥美國對華的貿易，叢刊一，278頁

⑦嚴中平等：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選輯：22頁

⑧資料叢刊：一冊，166頁

多到“吸者日众，鬻者愈多，几于火烟相等”^①于是“上自官府紳紳，下至工商伏隶，以及僧尼道士，隨在吸食”^②。“直省地方俱有食鴉片烟之人，而各衙門尤甚，約計督撫以下，文武衙門上下人等，絕无食鴉片烟者，甚屬塵塵”^③。但是，“近日四民中，唯农民不嘗其味”^④。这样，鴉片之毒害对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影响。首先，鴉片吸食者自身遭到精神上，肉体上的摧殘：时人有鴉片烟古风一首，恰刻出其被摧殘壯况他說“癮成信如潮，晷刻不差秒，携带偶遺忘，性命不可保，涕泣立橫流，形容頓枯槁，厭厭陳死人，僵立但未倒”^⑤。“瘦肩聳山鼻流水，見者咸呼鴉片鬼”^⑥。所以馬克思引証一位正直的英國人的話，說明其毒害作用：“……但是鴉片販賣者在使不幸的人們的精神木質腐化，墮落和毁灭以后，还毒害他們的身体”^⑦。而問題还不仅仅这二百余万統治阶级分子之自身腐化而已，正因為他們是統治阶级成員，所以他們会利用各种職权，来加强搜刮人民，导致人民之负担加重和生活的水平降低。其次，对社会經濟方面之影响：鴉片大量輸入，改变了中外貿易中中国出超的形势，以中英1830年之貿易額为例：英国在不到2500万元之輸入价之中，鴉片占1300万元；而中国出口貨物总值，則不足于880余万元，于是不得不用白銀支付，于是白銀外溢印成为一种趋势，这种趋势从十九世紀初始，历年都流出自銀在百万两以上^⑧。估計仅战前廿年期間，白銀流总数即不下一亿两。白銀流出的直接后果，一方面劳动人民負担加重，另方面是工商业凋弊。中国并不大量产銀，但却以白銀銅錢作为貨币在市面流通。既有二种貨幣形式，即要有一定之比价，“向時紋銀一兩，發錢千”^⑨但由于白銀外溢，是以“內地銀兩漸形短絀”，銀价上漲，錢价低落。1838年时，“每銀一兩，易制錢1600有奇”^⑩。1839年时，“江西省城……銀每兩易錢1630余文”^⑪。农民，手工业者通常用制錢，而清政府之賦稅則納銀，“各省現征錢糧，至少之处每兩收制錢1800文……小民只知銀一兩錢一千之制，以一千八百輸官，譏讀言四起”^⑫。各省盐商卖盐俱系錢文，交課尽归銀两，昔則爭為利薮今則視為畏途^⑬。然商人（大商人）往往为地主，統治阶级成員，則也昂貴物价，故尚无有因漲銀价而受其害。但对农民，手工业者來說，因售农副產品，計工受值所得区区之数往往以錢計故，实际收入随着錢之日賤大加降低了，而完稅納課之負担增加了，是以劳动人民无不遭受其害。銀为社会商品流通之手段，銀之短絀，商品流通也必受其影响。林則徐曾指出說：“臣历任所經，如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闢闢聚集之地，疊向行商鋪戶暗訪密查，僉謂近來各種貨物銷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貨有万金交易者，今只贖得半之數，

①資料从刊一冊 157 頁

②同上，一冊 463 頁

③同上，一冊 414 頁

④同上，一冊 296 頁

⑤同上，一冊 295 頁

⑥同上，一冊 299 頁

⑦馬恩論中国：81頁

⑧參看严中平輯經濟史資料選輯第34頁

⑨鴉片戰爭史实考 3 頁

⑩道光東華錄；道光十八年，頁14

⑪經世文續編卷五十八

⑫資料从刊一冊，512頁

⑬資料从刊一冊，464頁

向其一半售于何貨，則一言以蔽之曰鴉片烟而已矣①”。大量白銀流出結果，社會流通貨币減少，严重的影响了資本积累，損害了資本主义萌芽发展。吸食鴉片者日增，又漸影响到农业生产。有些人看到銷售鴉片有利可圖，以于是竟有种植鴉片，趋利者。御史邵正笏說：“近年內地奸民竟有種賣之事，浙江如台州府屬種者最多，宁波、紹興、嚴州、溫州等府屬次之……此外如福建、廣東、雲南，亦皆有種賣……，若不禁止盡絕，將來必至傳種各省，不特貽害善良，更屬妨耕作”②。再其次：清政府也受到鴉片威胁。鴉片輸入、皇帝、貴族，京內外官員、胥吏、兵丁、各个集團、個人大受其利，勿庸置疑；但對清朝整個統治來說，已感到財源涸竭，財政發生危機。所以個別統治者，惊呼到：“以中國有用之財，墳海外無穹之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片不知伊于胡底！……若再三數年，銀價愈貴，奏銷如何能辦？稅課如何能清？”③是以統治階級中有遠見之人已鑑及到清政府統治之危機。誠如馬克思所言：“鴉片取得的對中國人的統治權有多大，則皇帝及其遇腐的官僚集團所失去的自己的統治權也即有多大”④。

如前所述，鴉片之輸入，對廣大勞動人民來說感受其害，因此對之鴉片是深惡痛絕的。真正的勞動人民，不但自己不嘗其味，而且還反對鴉片之輸入。1838年12月12日廣州人民拒毒運動，就是反對鴉片輸入的一種反映，其事原委是這樣：中國政府當局準備斬死一個鴉片販子，並在商館廣場行刑。而所謂外僑——實際上是鴉片販子，在兇狠狐悲的情緒支配下，竟欲無恥的想要“阻止將被處死的犯人直綁在十字架上”⑤，特別是以東印度公司船隻——奧威號船主湯姆，拉金斯為首的鴉片販子竟公然“將刑架拆毀，拿着這些木塊向執行者及附近的中國人的頭及肩亂打……水手們把為官吏蓋的棚子給撕碎了，推倒了椅子和桌子”⑥。這種暴行既干涉了中國之主權，又表現了想要繼續破壞禁煙的非法企圖，引起廣大人民之憤怒。“有的中國人，因被幾個外僑推趕而激怒，遂用石子來報復。他們擲的快而有力，如急雨驟至、大多數中國人善于投擊的。僑商不得不退回商館”⑦。“整個下午這群亂民繼續包圍着館”，“有八千到一萬的壞人要消灭洋鬼子”⑧。這些材料中，雖然自己把鴉片販子粉飾成為“僑商”，把中國正義行動污之為“亂民，壞人”，但是也不得不承認中國人之勇敢，和自己的暴行被人民反擊下退回商館的事實。而這個事實，正是反映了中國勞動人民對鴉片和鴉片販子之憎恨行動的表現。

統治階級中，由於利害不同，因而在1835年到1838年之所謂禁煙之第三期中，對禁煙的意見更是紛糾不一，然基本上分三種意見：第一、以許乃濟為首的弛禁派，是鴉片走私获利集團的公開代表；1836年時，許乃濟以“閉關不可，徒法不行”的借口下，主張“准夷商將鴉片照药材納稅”入口，但“只准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文武官員士子兵丁等，不得任令沾染惡習”，“其民間吸食販運者一概勿論”。“寬內地民人栽種罂粟之禁”，使“外洋之來者不禁自絕”。顯然這種主張，給鴉片販子販運鴉片大開方便之門，並且給土烟盛行开辟道路。無怪乎英國鴉片販子稱為“立論極佳，文字也極清楚”，“聰明辦法”⑨；中國

①林文忠公政書，錢票無甚裨益宜重禁吃煙以杜弊鴉片

②資料叢刊一冊，158頁

③同上—464頁

④馬恩論中國：23—24頁

⑤賓漢：英軍在華作戰記：16頁

⑥⑦威廉，享德：廣州番鬼錄

⑧賓漢：英人在華作戰記：16頁

⑨賓漢：英人在華作戰記叢刊五冊11—12頁

有关鴉片分潤官員称赞“实于国計民生，均有裨益”了①第二、以林則徐、黃爵滋为首的严禁派，代表中小地主商人、主張严禁鴉片。1836年冬天，禮部侍郎朱樽即上奏請禁，隨之而来的兵部給事中許球，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先后上奏請禁。許球之奏議中斥弛禁論說：“既不禁其售卖，又岂能禁人之吸食？若只禁官与兵，而官与兵皆从士民中出，又何以予为之地？明知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織其課稅，堂堂天朝，无此政体！”②袁玉麟在奏折中談到，鴉片之禁无效是“事办不动之字借口，而其尤為因循迁就者，莫如鴉片弛禁之議”。③着列舉戾于是非者三，“閑于利害者六，逐条駁斥弛禁之弊。弛禁的氣氛被严詞义正的指責接不敢再囂張了。1838年鴻臚寺御黃爵滋“严塞漏絕，以培國本”折中、痛陳“习俗浮靡……漸染成風”；“运銀出洋……岁漏二千万”；“奏銷如何能办？稅課如何能清？設有不測之用，如何能支？”接着斥不能塞漏卮之弊。最后指出“夫耗銀之多，由販烟之盛，販烟之盛，由于吸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販，則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黃爵滋之奏議，触到道光皇帝痛处——財政困难处，所以下令各省督撫“各抒所見。各省督撫廿八人中，有廿人反对吸食者治罪，其中以琦善为代表；有八人贊成吸者治罪以林則徐为代表。林則徐先上“籌議严禁鴉片章程”折，用六条具体办法，补充了黃爵滋之严禁主張。隨着又上“錢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中，斥責了官吏包庇鴉片犯子之罪行，駁斥了吸者无罪論調，并警告道光說“当鴉片未盛行之时，吸者不过害及其身故被杖徒已足蔽辜，若犹泄泄視之，使數十年之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餉之銀”，兵餉为統治者最关切要的問題，所以道光帝維持統治秩序的心里受到感动，同意了严禁主張，”并任命林則徐为欽差大臣，赴广东查办禁烟事宜。維持封建統治的禁烟主張——客观上符合人民利益的主張，暫時取得胜利。但是和鴉片販子息息相关的投降派，并未因此而干休，只不过是待机而动而已。第三，穆彰阿、琦善为首的投降派主張維持現狀，他們是大地主当权派集团，既从走私鴉片中获得利益，又往往自身沾染鴉片之吸习。因此以“有伤政体”之名反对弛禁，表現上和严禁派主張同，以反对弛禁姿态出現，但实质上想繼續走私以納賄。用以“聖朝寬大”之名，反对严禁，給賄販走私和自己吸食开辟道路。所以琦善反对黃爵滋重治吸食主張說：“一吸鴉片，即罹法網，將見縲絏之人載道，囹圄无隙地可容……若吸食者尽誅，即閏广而論，吸者十居七八，十万人恐不能尽也。……一言之下，欲兴率土普天之下之大獄，所真断乎其不可行者也”④而林則徐任命赴广查办禁烟事宜时，琦善又威胁林則徐，“囑文忠无启边衅”⑤！穆彰阿对林則徐任欽差大臣，节制沿海水师，所謂“国初以来未有之曠典，文忠破格得之”之事，“亦为之动色”⑥。表明投降派处处在与严禁派为难，严禁派之前程正是困难重重。所以，“有識者为文中危”并非偶然。

三、林則徐領導下的严励禁烟运动

林則徐（1780—1850）福建候官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受到过傳統的封建教育，通过科举图徑，擠身于統治阶级高級官吏的行列。

①郭廷明：近代中国史第二冊86頁

②許球：請禁鴉片疏：丛刊一冊 452 頁

③筹辦夷務始末卷一，十二頁

④資料丛刊一冊 495 頁

⑤⑥客城閣話，叢刊一冊，314頁

林則徐雖系封建統治階級中的一員，但和一般的統治階級有所不同。他雖也學帖括之學，但“实事求是，不涉時趨”。“盡識先朝掌故，及兵刑諸大政，益以經世自勵”^①。為吏時認真辦理水利特別是黃河水利，督辦興修較有成績。對人民之疾苦、有所注意，并認真濟賑災民。這些措施對人民來說、總算比无情搜刮人民的活動要好的，所以“一時賢名滿天下”^②。黃爵滋請禁煙議時，林則徐出任湖廣總督，并且認真禁煙、獲有成效。經過切身之實際禁煙活動，而贊成嚴禁鴉片，他曾上奏皇帝說：“夫鴉片非難革癮而難于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忧心之法？”^③并認為“臣等查看輿情，并非不可挽救”^④。林則徐之嚴禁鴉片之言行，由於本身之名高望重，而嚴然成為嚴禁派之最高首領。然林則徐對嚴禁運動之困難處境，并非不知，在答龔自珍書中即表現出來。他說：“執事所解詩人悄悄之意，謂彼中游說多，恐為多口所動、第則慮多口之不在彼也。…而事有難言者”^⑤。而多不在彼，事有難言者，正是看到困難處境。但他抱着“冀為中原除此巨患、拔本塞源”^⑥之目的，“自念禍福死生，早已度外置之”^⑦了。禁煙運動，在林則徐之領導下、轟轟烈烈的開展起來。

林則徐出京後，發出傳牌，給沿途各州、縣、驛站官吏、不許供應鋪張，屬下詢私，造成严肃氣氛。又密剗广东當局，严密查拿販烟奸商頭目，快艇走私頭目等。英國大鴉片販子查咤，聞風逃遁，到倫敦宣傳和慇懃英國對華發動戰爭。林則徐到廣州後，得到兩廣總督鄧廷楨之合作、經過傳詢行商散商，經過啟粵秀書院之風氣試，了解到廣東實際情況。他知道了廣東人民要求禁煙；廣東海面停有二十二艘鴉片躉船、鴉片充斥廣東；洋商行商狼狽為奸；水師陳腐。於是林則徐確定了禁止鴉片流入的二個步驟，第一繳清鴉片，以清當前之毒品；第二使洋商具結，永不攜帶鴉片，以永絕於將來。

3月18日，傳諭行商，斥之說：“今鴉片如此充斥，流毒天下，而該商猶混行出詰，皆謂來船并無夾帶，豈非夢囁^⑧？責備大小官員十分嚴切，而該商等毫無關係，依然藏垢納污，實堪令人切齒”！同日又諭洋商：“將躉船鴉片，尽数繳官”；“并一面出具夷字漢字合同甘結，聲明嗣后來船，永不敢攜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⑨。并令行商“公同傳諭，限三日內取結稟復”^⑩。最後又向行商，洋商表示“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⑪。林則徐嚴正的措施，堅定的態度，引起雅片販子之恐慌。大雅片販子顛地也企圖逃跑；義律聞信也從澳門潛入廣州，企圖拥护顛地一起逃跑，並破壞禁煙運動，但是，“中國管店工人，圍住顛地之館，以防顛地逃走。看見夷人以手拉手奔出館來。……圍館之人就跑到岸边截住，見眾人進入公司館，圍館之人雖未行強，却大声喊叫如雷”^⑫令雅片販子等害怕。林則徐也及時的派兵包圍了洋行，撤退了給洋商工作的工人，下令封船，斷絕了義律保護下的雅片販子和雅片躉之來往和出入。義律等看到破壞繳烟阴谋失敗，不得不交出現存鴉片、共20083箱。林則徐表示承認繳烟，允每

①② 金安清：林文忠、公傳：叢刊六）253—254頁

③④ 林文忠公政書：91頁101頁

⑤ 林則徐答書：叢刊二、593頁

⑥ 林則徐致沈鼎甫函：叢刊二、568

⑦ 林則徐致姚春木、王冬壽書叢刊二570頁

⑧ 林則徐、信得錄、叢刊二冊240頁

⑨⑩ 林則徐、信得錄、叢刊二、242頁

⑪ 同上243頁

⑫ 澳門新聞紙、叢刊二、420頁

箱鸦片偿給茶叶五斤。义律为了扩大事态，另搞阴谋，命令雅片贩子繳烟，将来政府赔偿烟价。从而慾逼烟販促使英政府和清政府交涉，使英国趁事态扩大到两国政府之交涉之机，挑起衅端。林則徐繳烟步骤实现后，将烟販驅逐回国，下令恢复貿易。将繳获之鴉片銷毀于虎門。

林則徐令同邓廷楨、关天培从6月3日起到6月25日止在虎門銷毀了鴉片。銷毀鴉片之偉大行动，第一次向世界表示了中国人民純洁的道德心和反抗侵略的堅決性。这一偉大行动，甚致抱着“中国人不会焚毁一两鴉片的，即使燒烟，大部分鴉片一定会偷去”之心理去参观的外国人——美商船馬礼号船主弁遜，教士裨治文等人，也不得不承認林則徐等人办事認真彻底。裨治文紀文中写到：“我們反复考察燒烟的每一个过程，他們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的細心和忠实程度，远出于我們的臆測，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例事情会比执行这个工作更加忠实的了”。①

如前所述，林則徐堅決要洋商出具甘結。甘結，是为了永絕鴉片，并承認合法貿易，这对中国，外国之真正貿易來說，公平正义，无可非議。既是要求貨即沒官、人即正法，也是鴉片販子罪有应得。因此，林則徐之坚持具結方針，不論从商业、法律，道德观点之那一方面来看，都是正义的，正确的。但是，英國資產階級商人，保護資產階級的政府官員，却完全不顧正义和道德，为了保持鴉片貿易之利益，以义律为首的英國挑衅者，反对具結，破坏具結。

义律将林則徐催其具結式样撕得粉碎，并故意进行鴉片走私，他企图将“就有一万箱已經运到中国海面”②的鴉片、銷售出去。他給政府报告中承認：“真的，当我写这篇报告的时候，鴉片交易，正在广州以东二百英里的几个地方极其活跃的进行”③林則徐彙摺称，“并聞义律宣言于众，更要大卖鴉片……且又分遣三板：东駛西奔，凡潮州、南澳、高、廉、雷、瓊該夷船所不应到之地，无不窜往，每以劈柴作为招牌，写明鴉片一个洋銀几元字样，于潮漲时随流送入国内，誘人售买，遇有兵船驅逐，胆敢先放枪砲，恫吓抵抗”④。义律为扩大事态，获得挑衅借口，他命令英國商船，一律不准开入黃浦，企图把禁止鴉片事宜和中英正常貿易糾纏在一起。同时給英政府写报告，把禁止雅片行动說成是，不义的暴行”⑤。

“侵犯英國生命財產”⑥、“侵犯英王尊嚴”⑦、并建議“理当具有要求充分的赔偿和未来保障的权利”、要求政府对中国进行“十分迅速而有力的干涉”⑧。这些意見得到英政府重視。國內鴉片盜益集团受到严禁之打击，也暗加破坏。投降派制定查禁鴉片章程共有三十九条，可謂条文极密。但却規定一条：吸食之只准官弁訪拿，不許旁人訐告⑨。无异給吸食者、販运者开一后門，林則徐曾指出：“蓋以衙門中吸食者最多……被正欲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安肯破获以断来路”⑩。投降派甚致直接攻击林則徐之严禁和具結之方針。他們指責具結說：遂以为永断根株、徒令接办之人，开一含混之路，甚非为我皇上为时除害拔本塞源之至意矣⑪。具結的方針、虽受到內外鴉片販子之破坏，攻击，但仍然取得初步胜利。从6月

① 三所集刊：一集128頁

② 馬士：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第一卷261頁

③ 同上262頁

④ 郭廷以近世中国史第二冊184頁

⑤ 三所集刊一集128頁

⑥ 紳刊一冊，374頁

⑦ 林文忠公政書103—104頁

⑧ 筹辦費務始末，卷六20頁

恢复貿易起，到10月之四个月中，进口外商船只六十二艘，除了沒有英船外，各国的都有，其中美船有四十五只。进口番銀达200余万元，为数年之所无的現象。

置中英在具結問題上僵持之时，又发生了1839年7月7日林維喜被英國水手毆燒事件，使中英关系更加恶化，具結斗争更加复杂。林則徐要义律交出凶手，而义律竟拒凶，拒不交，显然欲破坏中国法权。林則徐为林維喜生命負責，为维护国家主权計，下令断絕供应英人之柴米食物，义律等技穷、退到船上。义律不但不具結，不交凶，而且竟欲进一步进行武装挑衅。

英人有意挑衅、林則徐“本在意中，…到粵之后，請勒下沿海严防者亦已五次”①。1939年后半年，展开了挑衅，反挑衅的斗争。林則徐为了了解英人之习俗、行动，”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譯西書、又購其新聞紙”②，因而“洋人旦夕所为，絶悉必获聞”③。林則徐从这些新知識之中，扩大了眼界，分清了鴉片商人和正当商人，英商和英政府之区别，英国和其他国家之区别；清悉了他們之間的矛盾。从而帮助了林則徐在以后之斗争中，能够得以作出正确的决定和措施。林則徐深知水师不足以在海上交鋒之弱点，而决定增强陆防和依靠人民力量来御敌。“于虎門橫檔嶼設木筏鐵練、橫亘中流，購西洋各国洋砲二百余座，排列两岸”④、以加强海岸陆防。这种措施，貫串着以守为战的战略，于水师陳旧不能御敌于大洋之条件下，是正确的。特別是林則徐和一般統治阶级不同的是相信人民力量。他給皇帝奏摺中指出說：“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庄，不但正土端人銜之入骨，即漁舟村店亦恨其强梁，必能自探身家、团練抵禦”⑤。他从“民心可用”出发，而得出“号召民間丁壯，已足抵制其命而有余”的認識⑥。于是招募西人畏惧的沿海梟徒、漁船、艇戶丁壯五千、“每人給月費銀六元、贍家費六元”⑦、习以火攻之术，以便“备火船、乘黑夜潮退、出其不意分起潛出，乘上风攻其首尾”⑧。訓練結果是号令严明，声势甚壮”⑨。林則徐之防御措施，是正确的，特別是相信民心可用，对于一个統治阶级成員來說，是难能可貴的。正因为如此，在民族矛盾严重的时候，才把林則徐和統治阶级加以区别，称他为偉大的爱国者。

8月底印度开来二艘兵船、增援义律、义律以为有恃恃于9月4日、砲击九龙、以胁林則徐讓步。但被林則徐整頓了的水师，反击而吃了敗仗，挑衅失败。11月3日英商船也欲具結入口，义律恐破坏其挑衅阴谋，竟派兵船向保护商船入口的中国水师巡船砲击，中国水师在穿鼻洋海面又奋起反击，将英国的兵船再一次打得狼狽敗陣而逃。以后，十天之内，先后向官涌海面六次袭击，但是那一次也未有得利，于是不敢再行造次，而单待英軍之增援，以扩大战争。英軍挑衅的失败，表明了林則徐整頓水师海防和以守为战的策略初步胜利。英軍在挑衅期间，英国商船有五六十艘、聚集在中国海面，由于义律阻抑前往广州具結，既无充分食物淡水供应，又使运貨潮湿霉烂，于是对义律“怨讐言同声”。可見林則徐坚持具結，分別对待的政策，不仅从中国断絕一时鴉片上白银进口上表現出来正确、还从英国孤立，商

① 林則徐致姚春木，王冬寿书：叢刊二冊，570

② 鴉片战争史实考，48頁

③ 林則徐傳：金安清著叢刊六冊，258

④ 鴉片战争史实考48頁

⑤ 筹苏办夷务始末：卷7頁

⑥ 林文忠公政書112頁

⑦⑧ 鴉片战争史实考48頁

⑨ 夷氛記聞，叢刊六冊19頁